

**R**ELIGION AND  
AMERICAN SOCIETY  
(Volume 7)

主编：徐以骅  
涂怡超  
刘 骞

宗教与美国对外关系

宗教与美国社会

第七辑



时事出版社

RELIGION AND AMERICAN SOCIETY

# 宗教与美国社会

——宗教与美国对外关系

(第七辑)

主编 徐以骅 涂怡超 刘 骞

时事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与美国对外关系 (第七辑) /  
徐以骅等主编.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80232-232-5

I. ①宗… II. ①徐… III. ①宗教 - 影响 - 对外关系 -  
研究 - 美国 IV. ①D871.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51403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巨山村 375 号

邮 编: 100093

发行热线: (010) 82546061 82546062

读者服务部: (010) 61157595

传 真: (010) 82546050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shishe.com

印 刷: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8.125 字数: 400 千字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项目批准号：06JZD0005）、复旦大学美国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后冷战时期的宗教与美国外交”（项目批准号：05FCZD0015）、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美国的宗教非政府组织研究”（项目批准号：06JJJGJW001）、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整体推进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中国国家建设”的资助

## 《宗教与美国社会》编委会成员

- 徐以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 涂怡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 秦 倩 复旦大学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 刘 骞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 章 远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
- 王 栋 芬兰图尔库大学东亚研究中心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Turku, Finland)
- 邹 磊 (学术秘书) 复旦大学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 目 录

- ◆ 重视宗教与美国对外关系的研究(代序)…………… 徐以骅 ( 1 )
- ◆ 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天主教会与美国外交政策  
——历史语境和现实挑战…………… 彭小瑜 ( 5 )
- ◆ 后传教时代的宗教与中美关系…………… 徐以骅 ( 70 )
- ◆ 从基督教社会活动家到国务活动家  
——贺川丰彦与美国影响下的战后  
世界…………… 陶 波 ( 98 )
- ◆ 传教团体对美国东亚政策的影响  
——以抗日战争期间赴华与赴日之美国传教士  
为例的比较分析…………… 袁 珺 (163)
- ◆ 信仰的机会:宗教非政府组织对  
美国外交政策之影响  
——以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后重建  
为例…………… 朱晓黎 (193)
- ◆ 美国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对抗政治”参与

- 以“倡议国际”组织为个案…………… 张 珺 (215)
- ◆ 美国式伊斯兰复兴及其外交效应
- 冷战后美国穆斯林外交游说的  
发展…………… 何健宇 (236)
- ◆ 当代美国学界关于美国宗教与政治研究  
综述…………… 涂怡超 (267)
- ◆ 美国的宗教与法律…………… 秦 倩 (305)
- ◆ 奥巴马对小布什“以信仰为基础的  
倡议”的继承与发展…………… 李 瑶 (331)
- ◆ 边境地区的宗教遗产与集体记忆：  
柏威夏寺的庙宇政治…………… 章 远 (359)
- ◆ 试论欧洲宗教世俗化的形成原因…………… 孙艳燕 (379)
- ◆ 上帝信仰对韩国以色列关系的影响…………… 钮 松 (406)
- ◆ 新教与民主…………… 戴维·马丁(David Martin)著  
刘 骞译、徐以骅校 (422)
- ◆ 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挑战、影响  
路径与地缘宗教…………… 徐以骅 (435)
- ◆ 当代美国社会中的宗教  
(第四至第十章)…………… 约翰·F. 威尔逊(John F. Wilson)著  
章志萍等译、徐以骅校 (450)
- ◆ 作者简介…………… (569)

# 重视宗教与美国对外 关系的研究（代序）

• 徐以骅

宗教因素在中美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被喻为中美关系的温度计或风向标，研究美国宗教以及宗教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是国内美国研究中的一项既具基础性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笔者曾指出：“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中美宗教交流是中美之间在思想文化、价值观和情感层面的互动，当然要比经贸等交往更为深刻、更具基础性和长期性。”<sup>①</sup>。

然而，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对两国关系中宗教因素的研究，却远不如对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因素的研究那样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研究水准也难以望上述诸研究之项背。美国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殿堂级学者、笔者称之为美

---

<sup>①</sup> 单渭祥：“访美归来的期盼——专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徐以骅博士，”《天风》，2011年第12期，第49页。



国“宗教知华派”代表人物的裴士丹（Daniel Bays）教授在其新著《中国基督宗教新史》<sup>①</sup>以及此前其他论著中多次指出，长期以来美国关注以及辩论中国基督教问题的个人和团体，绝大多数对中国所知甚少，因此直到目前美国有关中国基督教的“公共话语”或讨论水准仍十分粗浅，更多在发泄情绪而不是发布事实信息，而且趋于两极化。其实美国对中国基督教的此种可被称为“高情绪化的低水准认知”在对其他宗教以及宗教政策的总体认识上也普遍存在。推而广之，即使是美国许多社会精英和决策圈人士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般情况也所知不多，更何况普通民众了。近年来美国一些民调表明大多数美国民众认为中国是世界领先的经济强国就是一个经典实例。不过，由于在经济、政治和其他领域的中美频繁交往以及各种利益的驱动，在这些领域中的“知华派”在美国社会舆论和政治决策中还可成为某种具有牵制性甚至主导性的力量。但美国的“宗教知华派”却势单力薄，很难冲破由传统偏见、以偏盖全的思维定式、意识形态桎梏、利益团体政治乃至冷战心态等等所编织的重重迷雾而影响美国社会舆论和政治决策，在宗教领域塑造中国正面形象的巨大阻力与诋毁中国言行的畅通无阻形成了极大反差，更何况即使“宗教知华派”一般也并不能对中国的宗教政策和发展状况秉持内外一致的积极正面态度，当然“知华反共”或“知华不友华”在其他领域也是常见的现象。套用一句基督教宣教学的术语来说，目前美国基本上还是中国宗教全面真实信息的“未及之地”。

<sup>①</sup>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West Sussex, UK: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2).

反观中国，对美国宗教以及宗教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在政（府）教（会）学（术）三界都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关于这些议题的“公共话语”和民间议论通常也比较简单化，并且同样存在着误解、分歧乃至对立。一般来说，中国民众对于美国社会的了解往往多于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社会的了解，但宗教领域却可能是一个例外。就学界而言，尽管近10多年来一些论著陆续问世，有的学术期刊如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的《世界宗教文化》还推出美国宗教研究专栏，但与美国研究的其他领域相比，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由于资讯不够发达、实地或田野研究付之阙如，以及对宗教研究的诸种束缚，学界的美国宗教研究除少数例外实际上还处在偏重历史（主要是美国在华传教史）、文献综述和译介的阶段。就基督教而言，实际上“中国教牧领袖对美国基督教的实际情况，比如对水晶大教堂、柳溪教会和马鞍峰教会等著名教堂和教牧的了解，要远胜于许多学者”。<sup>①</sup>因此国内学界对美国宗教以及当前中美关系中宗教因素的研究，较之于宗教在美国社会和中美两国关系中的地位 and 重要性也是极不相称的。可以说宗教是目前中美之间相互认知水准最低、信任赤字最大、分歧最为严重和研究最不充分的一个领域。推动国内学界对美国宗教尤其是美国对外关系中的宗教因素的研究，减少各种猜疑和误判，尤其是减少过于政治化的解读，对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本辑收录的论文比较集中地讨论宗教与美国对外关系。其内容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主要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讨论宗教

<sup>①</sup> 见前引《访美归来的期盼》，第49页。

和宗教团体在美国外交及其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部分则主要讨论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宗教与当前国际关系等问题。在本辑的编辑出版过程中，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复旦大学外事处等均给予了一贯的支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项目批准号：06JZD0005）、复旦大学美国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后冷战时期的宗教与美国外交”（项目批准号：05FCZD0015）、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美国的宗教非政府组织研究”（项目批准号：06JJJGJW001）以及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整体推进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中国国家建设”等项目为本辑的出版和撰稿者的研究提供了经费资助，北京大学历史系彭小瑜教授、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戴维·马丁（David Martin）教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宗教系约翰·F. 威尔逊（John F. Wilson）教授等惠赐本辑专稿，本刊编委会的涂怡超博士和刘骞博士协助编辑了部分稿件，对于上述单位和学者本人在此深表感谢。由于本辑作者大部分为青年学者，研究功力还较稚嫩，加上本刊编委会和本人编辑能力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祈望读者批评指正。

# 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天主 教会与美国外交政策

## ——历史语境和现实挑战\*

• 彭小瑜

**〔内容提要〕** 罗马天主教会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基调在教宗约翰二十三世就职以后发生重大变化。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基督宗教权利思想在 20 世纪后半期的语境中不仅再度成为天主教社会思想的主流，而且也直接影响到教会对和平和国际事务的见解。这同时也意味着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立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至上准则开始遭受严重的挑战。美国天主教会在后冷战时期对美国对外政策

---

\* 本文是笔者参与徐以骅教授所主持课题“后冷战时期的宗教与美国外交”（项目批准号：05FCZD0015）的研究成果，主要内容曾经作为阶段性成果分别发表于《国际论坛》（2010 年第 1 期）和《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0 年第 6 期）。这里是该项研究成果的全文。

的看法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是《和平的挑战》和《正义的收成》两部和平牧函的自然延伸，其中关于人权的讨论构成美国对外政策道德话语的一个重要侧面。美国的主教和神学家们清楚地意识到，规避人权、单纯考虑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是帝国主义时代自私恶俗的话语特色，已经无法适应后冷战时期的国际社会格局。

后冷战时期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9·11”事件以后的反恐行动成为美国主教团在新的外交政策背景下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关注焦点。无论是美国主教团，还是信仰天主教的美国教士和平信徒，在思考和讨论和平问题的时候，都将罗马天主教的思想传统与美国政治、文化和外交政策做了紧密联系。他们就战争与和平问题提出的见解，既体现罗马天主教的传统，也具有鲜明的美国特色。

针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天主教会国际问题的看法，我们在这里所做的讨论将偏重在其思想渊源的探讨上，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会集中在对《和平的挑战》的评估上。后冷战时期美国天主教会就政府外交政策提出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是约翰二十三世以来罗马天主教会调整其社会思想的结果，是由人权和人的尊严等新观念塑造而成的，是对传统的国家主权理念的修正和挑战。这些意见与美国政府实际采纳的政策建议并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相左，但是它们所体现的道德准则以复杂的形态、在不同的程度上参与了政府的决策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道德说教，与美国思想和文化领域其他的因素结合在一起，有助于美国在后冷战时期的国际社会占据道德制高

点，最终构成当前美国世界性影响力的一个关键和不可或缺的方面。

## 一、对《和平的挑战》的注解与批评

美国主教团在1983年就世界和平问题发布牧函《和平的挑战》，在综合罗马天主教的社会训导与美国文化和政策传统的基础上，对20世纪后半期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批评美苏争霸，反对核军备竞赛。该文件在本国和国际社会引起巨大的反响，被当时的芝加哥枢机大主教约瑟夫·贝尔纳丁（1928—1996年）称为美国主教团有史以来发表的“最重要和及时”的牧函。到1993年，在《和平的挑战》发表10年之后，美国主教团又就战争与和平问题发布牧函（《在和平中播种正义的收成》，以下简称《正义的收成》），在后冷战的语境中继续倡导天主教的和平理念。

理解美国天主教会及其主教团对战争与和平以及其他国际问题的看法，必须注意到他们对教宗有关通谕的阐释和应用。利奥十三世（1878—1903年在位）在1891年就社会问题发表的《劳工通谕》（*Rerum Novarum*）开始了教宗对工资、私有财产和劳资关系等现代经济关系诸方面的讨论。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教宗社会通谕的关注点也逐渐转向国际关系，转向战争与和平问题。

### （一）对“正义战争”的修正

由庇护十一世纪念《劳工通谕》的通谕开始，教宗们对

社会经济问题的看法逐渐地与他们对国际问题的看法联系起来，他们的这一倾向最终在约翰·保罗二世的一系列社会通谕里面得到了系统和深度的展开。约翰·保罗二世（1978—2007年在位）对保罗六世（1963—1978年在位）社会思想的概括——“发展是和平的新名称”——集中地体现了罗马天主教会将社会经济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结合起来考虑的思维特点：无论是一个特定社会内部穷人与富人的差距，还是国际社会穷国与富国之间的鸿沟，都是不符合人类公益的发展缺陷。健康的社会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必须考虑到人权和人的尊严，考虑到天主造物用诸全人类的恩典，这样才能创造和谐国际关系以及真正世界和平所必要的条件。<sup>①</sup>

庇护十一世（1922—1939年在位）在《劳工通谕》四十周年时发表社会通谕（*Quadragesimo Anno*），更清楚地阐释了基督教爱德在建立和谐劳资关系以及推进公益方面的关键意义，他在这里关注的重点是特定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关系。<sup>②</sup>到底护十二世在位时期（1939—1958年在位），由于核武器的出现和冷战的严峻局势，教宗必须正面应对与和平问题紧密关联的国际关系问题，并使用天主教传统和道德的力量来处理之。庇护十二世意识到，现代的国际争端不可能用武装冲突的方式来解决，“一点火花就可能触发巨大的火焰”，导致“众

<sup>①</sup> *Populorum Progressio* 87; *Sollicitudo Rei Socialis* 10. 本文所使用的教宗通谕，如果没有特别说明，均出自 David J. O' Brien and Thomas A. Shannon, ed., *Catholic Social Thought: The Documentary Heritage* (Maryknoll, New York: Orbis Books, 1992)。

<sup>②</sup> *Quadragesimo Anno* 137.

多人的死亡”。国际社会的公益和永久的和平不可能通过战争来取得，只有通过“理性、法律、审慎和正义”来取得。<sup>①</sup>

具体而言，教宗将“正义战争”的概念界定为严格意义上的反侵略防卫性战争，拒绝承认战争是回应其他形式的伤害和不正义行为的合法手段，从而使得“正义战争”概念更加狭窄了。在教宗看来，即使是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也不得使用战争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和正当利益。这一观点与现代流行的战争伦理道德是不同的，也是对天主教传统的“正义战争”理论的修正，预示着天主教关于战争与和平理论的发展趋势。但是在两个问题上，庇护十二世的意见与美国主教发表的《和平的挑战》是不同的。首先，他明确反对天主教徒以良心为理由在一场正义战争中拒绝服兵役。按照约翰·考特尼·默里的解释，教宗意见的主要意图是支持北约民主国家的防卫。其次，他没有明确地提出，核武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用。默里对此解释说，在认可单纯防御性战争的时候，教宗不仅承认了常规武器使用的合法性，也有条件地承认了使用核武器可能是正当的，但是他对核武器合法性的认可有着极其苛刻的限制，并且注意到，如果核武器的使用失去控制，威胁到人类的生存，那么在任何情况下使用之都是不道德的、必须避免的。默里认同庇护十二世对“多愁善感”的绝对和平主义的批评，因为他们都认为，在战争的悲剧之外可能还有更大的邪恶。他们的见解是，如果否定有限度战争的防御作用，也就是说，如果将西方阵营的策略局限在要么在全面核战争中毁

<sup>①</sup> *Luctuosissimi Eventus* 3; *Laetamur Admodum* 8-10. 出自 Claudia Carlen, ed., *Papal Encyclicals 1939-1958* (Ann Arbor, Michigan: Pierian Press, 1990).



灭、要么向苏联投降这两种绝望的选择之间，那将是一种极端危险的错误思维。<sup>①</sup>

默里写道：天主教会“正义战争”理论所“培育的唯一的内在的态度，是追求和平的意志，而这一意志在极端的情况下也包含着不惜以武力来实现和平的意志。这一使用武力的意志是符合道德的，其实等同于追求正义的意志”。默里指出，“政策的位置在权力领域和道德领域的交汇之处”。在他看来，如何将天主教战争与和平理论所蕴涵的道德理念贯彻于政府的政策，构成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在新的科技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挑战面前，军事理论的更新固然重要，但是更加紧迫的是建立相应的关于武力使用的“政治—道德理论”，因为“道德的功用恰恰在于控制、禁止和限制武器的使用，或者更一般地说，在于界定武力可以为什么目的而使用以及判定可以使用武力的情景”。<sup>②</sup>

## （二）乐观的约翰二十三世

如果说庇护十二世的战争与和平观点还带有浓厚的冷战和亲西方色彩，那么约翰二十三世（1958—1963年在位）对国际局势的看法却意味着罗马天主教会开始逐渐走出东西方阵营对峙的阴影，开始超越当时国际政治中严重的意识形态对立氛

---

<sup>①</sup> Lisa Sowle Cahill, *Love Your Enemies: Discipleship, Pacifism, and Just War Theory*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4), p. 207. 默里对庇护十二世的战争与和平观念的阐释，见 John Courtney Murray, “Remarks on the Moral Problem of War,” *Theological Studies* 20 (1959), pp. 40–61.

<sup>②</sup> John Courtney Murray, “Remarks on the Moral Problem of War,” pp. 56–61.